

中国现代史百题

下

湖南人民出版社

K26
48
221

中国现代史百题

王桧林 鲁振祥 编

(上)

湖南人民出版社



B 437471

K26
48
2:2

中国现代史百题

王桧林 鲁振祥 编

(下)

湖南人民出版社



B 437472

中国现代史百题

王桢林 鲁振祥 编

(上、下册)

责任编辑：徐日晖 邓代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6.25 插页：4 字数：1294000

印数：1——5050

ISBN7-217-00110-2/K·9

统一书号：11109·408 定价：12.00元

新书目：87—25

前 言

为了反映建国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成果，供学习和研究中国现代史同志参考，我们选编了这部《中国现代史百题》。

中国现代史学（这里指的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这段历史）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史学分支，这门学科的真正建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的学术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史学界和整个学术界一样，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从五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左”倾思想的禁锢，特别是由于随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整个学术界变得十分冷落，几乎谈不上认真的学术研究了。在这种情况下，与政治现实联系最为密切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命运就更为悲惨了。在这个学术领域，自由探讨的学风几乎从未形成过，研究成果少得可怜。相反，那些背离历史实际的不实之说，却大量涌现。一部本应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中国现代史，竟变成干巴巴的个人独自创造历史的记录，历史事实往往是在作为新造神论的具体例证时才得到阐述。在中国现代史上起了进步作用的中间阶级和中间政派，则被一概骂倒。作为中国现代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历史，却不能如实叙述，甚至不能叙述，否则就是给反动

派树碑立传。研究者动辄得咎，研究工作走上了绝路。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拨乱反正的伟大转折。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口号，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至此，人们开始从“左”倾教条主义的禁锢中挣脱出来，重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观察和思考问题。

六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空前活跃。《历史研究》从一九五四年创刊至一九七八年，除中间停刊近七年外，十七年中，共发表有关中国现代史的文章约一百篇，平均每年六篇左右；而一九七九年以后六年中发表的文章已达七十余篇，平均每年十二篇左右。以往没有出版过一种反映中国现代史研究成果的期刊，一九七九年后，《近代史研究》、《党史研究》、《党史资料丛刊》等，先后创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综合刊物和各大学学报，每年刊登的中国现代史文章，在一千篇左右。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专著增加很多，除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修订再版外，已出版的有：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稿》、黄元起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王桧林等编著的《中国现代史》、王维礼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等，其他还有《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政党史》、《五四运动史》、《伟大的开端》、《北洋军阀史稿》、《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九一八”事变史》、《伪满洲国史》等等。出版的中国现代史资料、人物传记、文集、回忆录等，已多得很难统计清楚。和全国各个学术领域一样，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二

六年来各种报刊和内部文集发表的几千篇文章，其内容涉及到中国现代史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无论从深度或广度上说，同以往三十年相比，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若干历史问题澄清了是非，恢复了它们的本来面目。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叙述历史，是对史学工作的基本的也是起码的要求。但是过去长时期内，由于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干扰，由于新教条主义的危害，实事求是的学风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打着“古为今用”、“历史要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招牌，任意歪曲、编造历史。各种书籍和文章充满了历史的颠倒。分清是非、拨乱反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就自然地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界的首要任务。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新局面正是从这里打开的。

几年来，分清是非、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主要问题，可以举出以下这些：

(1) “南陈北李”传统提法的再度提出。这是对陈独秀、李大钊在“五四”和建党时期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恢复。

(2)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作用的重新评价。一些论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一分为二”的观点，对胡适在倡导文学革命、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宣传实用主义等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与几十年来通行的一概否定的观点不同的意见。

(3) 李立三、刘少奇在安源工人运动中领导作用的重新肯定。

(4) 古田会议及其决议形成过程的如实说明。否定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不合历史实际的提法。

(5) 瞿秋白历史地位的恢复。摘掉强加给他的“革命叛徒”的帽子，重新肯定他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和理论家、革命烈士应有的历史地位。

(6) 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争论性质问题的再研究。否定了“国防文学”是“汉奸文学”、“卖国文学”的错误论断，重新肯定这场争论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

(7) 否定了陈独秀在“九一八”事变后成为“汉奸”的说法。

(8) 解放战争初期“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的辨正和刘少奇在整个中国革命中重要地位的恢复。

(9) 民主党派和若干民主人士历史地位的肯定。

(10) 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如实评价。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问题，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固然，现在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评价，仍然不一定正确和全面，甚至可以说不可能十分正确和全面。但是迷雾已被吹散，突出的错误评价和有意的歪曲言词被抛弃了。实事求是精神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发扬光大。和全国同步，中国现代史研究工作上的拨乱反正，标志着新时期的开始。

第二，提出若干新的问题，开拓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

随着中国现代史这门学科的诞生，各种各样的绳索就把它捆绑住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有意无意地制造了许多“禁区”，许多研究领域无人敢去开拓，许多值得研究、需要研究的课题无人敢去探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长期不能展开，更不能深入。

全国解放以后，各高等学校历史系开设了中国现代史课程，

但课堂上讲的只是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一九五八年教育部召开的中国现代史讨论会注意到这种偏向，提出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研究，以显示中国现代史全貌的要求。在教育部领导下由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一书，在突破革命史、党史体系局限方面，迈出了很大一步。但随后并没有继续向着克服这种局限的方向发展，而是加重和扩大了这个局限。这种状况的发生是同当时提出的“中心论”和“主线论”两种观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心论”说：中国现代史要以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为中心，同时反映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全貌。这个提法实际是把对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的研究，当成叙述人民革命斗争的背景和陪衬。“主线论”说：中国现代史要以中国共产党史为主线，而党史又要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核心。结果，中国现代史就被简单化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战胜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史。在“文革”期间还有一种主张，叫做“一论带四史”，即高等学校历史系主要开设五门课：历史唯物论、中共党史、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中国农民战争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后四者以前者为指导。这样，中国现代史这门学科就干脆在高等学校被取消了。

还有一种长时期内流行的所谓“对口径”的思想和作法，严重地障碍着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开展。这种意见认为：毛泽东著作囊括了全部真理，对它只能注释、解说和学习，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是毛泽东一个人，阐发和解释毛泽东思想也只是少数人的权力，其他人都必须小心地向那些“正解”对“口径”，偏离“口径”，是不能容许的。说也奇怪，毛泽东思想产生在中国，从一九四五年被正式确定为全党指导思想之后，三十多年中，除了一本小册子以外，没有产生一部系统全面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著

作，直到一九八三年之后，才有初步论及毛泽东思想体系和发展史的《毛泽东思想史稿》、《毛泽东思想原理》等著作问世。这个事实足以说明问题了。

这里，我们并不是说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现代史领域就没有留下有价值的文章和著作，但实在是少得可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种种障碍和弊端在逐步克服，教学和研究人员逐步清除学术界流行的和自己身上存在的思想桎梏，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和新看法，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并已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

新开辟的研究领域主要有：

- (1) 中华民国史；
- (2)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 (3) 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民主党派史；
- (4) 中国托派史；
- (5)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
- (6) 伪满洲国史和汪伪政权史；
- (7) 现代历史人物研究；等等。

新提出（或有着新看法）的问题大致有以下这些：

- (1) 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问题。

(2) 毛泽东思想问题。包括毛泽东思想的形式和发展、老一辈革命家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等。

(3) 关于五四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开展较早也最为充分的一个课题。一九七九年以来的新进展表现在以下问题上：思想解放和反封建主义意义的进一步阐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中若干事实的发掘考订，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等。

(4)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包括产业落后的中国何以能产生无产阶级政党问题、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情况、“党的创始人”的重新解释、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一大”召开时间的考订等。

(5) 关于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包括三大政策确立的历史必然性及其伟大意义的进一步阐发、对孙中山晚年三民主义的分析 and 系统论述等。

(6) 北京政变和郭松龄倒戈事件的性质和意义。

(7) 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权问题。包括是否实现了党的领导权以及实现了哪些方面的领导权。

(8) 关于福建事变。包括福建事变发生和失败的原因、进步性质和意义、党在闽变期间的“左”倾错误和应吸取的教训等。

(9) 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若干问题。包括对它“统一”中国及其初期内政外交的评价、各派系的争斗和混战、“九一八”事变后对内对外政策的演变、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等。

(10) 土地问题和土地革命,包括对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各种土地主张的评述、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及各项政策的评论。

(11) 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右倾错误问题。包括党内“左”倾错误历史的考察、共产国际与中共“左”右倾错误的关系等。

第三,对若干问题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史学领域,在大批判涵盖一切以前的一段时间,曾出现过学术争鸣的局面,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中国近代史分期等问题,进行过讨论,从而为史学研究增添了活力。但就是在那个时候,在中国现代史领域,也基本是死水一潭,

除对个别问题如五四爱国运动的性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期等，发表过少量不同意见外，学术争鸣的局面始终没有形成过。这是因为这个领域的禁忌实在太多，史学工作者背上的政治压力实在太重的缘故。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思想路线的确立和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在中国现代史领域开始出现了。“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李大钊诞辰九十周年、“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都召开了学术讨论会。除了这些纪念日的讨论会之外，平时召开的专题学术讨论会，还有许多，如民国史讨论会、中国现代史体系问题讨论会、中国现代史教学大纲讨论会等。在学术讨论会上，在各个专业刊物和大学学报上，中国现代史工作者曾提出一系列问题，并展开讨论和争论。明显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意见分歧的问题主要有：

- (1) 中国现代史从何时开始；
- (2)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否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 (3)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完成的时间和标志；
- (4) 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
- (5) 孙中山三民主义有无新旧之分的问题；
- (6) 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和战略方向问题；
- (7)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有无及其形成的时间和标志；
- (8) 毛泽东与立三路线的关系；
- (9) 富田事变的性质；
- (10)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形成的时间和标志；
- (11) “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形成的时间和标志；

(12)《多余的话》的评价;

(13)西路军问题;

(14)百团大战问题;

(15)皖南事变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的提出和争论,表明了学术空气开始活跃起来。

三

如上所说,近几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新局面的出现刚刚开始,取得的成绩仅仅是初步的。要把三十年这个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时代的丰富内容,把三十年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所造成的历史,用文字准确地、生动地、全面地表达出来,探索出这段历史的具体规律,总结出新的历史经验,用以指导现在,预测将来,还需要做很多很多研究,克服许许多多障碍。这些障碍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有的是外部的,有的是中国现代史研究本身的。这里就中国现代史研究本身,谈谈进一步开展研究的一些问题。

第一,必须进一步解除教条主义和各种“左”倾观点的束缚。

长期以来,很多的历史结论,若干观察问题的指导思想,是僵化的,“左”倾的。例如关于遵义会议问题,过去的一些提法就蕴含着领导地位终身制的思想,是明显地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再如,过去几乎所有的中国革命史、现代历史书籍和有关文章中,见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批,见到资产阶级就骂。编一套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主张的资料,也必须标明“供批判”之类的字样。写五四运动,在轻描淡写资产阶级参加了“三罢”之后,接着就用更多的笔墨批判“文明罢工”之类的言论。写五卅运动也一样。本来五卅运动是一个联合战线的运动,但是看不到民族资

产阶级的作用，只看到他们破坏运动。我们不是说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我们这样说，正是因为过去的研究违反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正确论断。

现在“两个凡是”被抛弃了，教条主义枷锁被打破了，若干“左”的观点被清除了，但彻底消除它们的消极影响，还要做广泛深入的思考和巨大的努力。

第二，必须注意宏观研究，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开拓更广阔的研究基础。

所谓宏观研究，就是综合的、全面的、整体的，贯通过去、现在、未来的研究。作为中国通史一部分的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离这样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例如，经济史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因此也就很难对政治经济文化做全面的、综合的论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现代通史不能不包括少数民族的历史。关于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有的单位和个人做了不少研究，但在中国现代通史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映。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历史是在时间上展开的。任何历史事件都有个发展过程。一般说来，过程越长，事件整体及其各方面就显露得更充分。有些重大事件需要经过或长或短的一定时间才能看得清楚。因此，通观历史发展的相对完整的过程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宏观的一个方面。拿大革命时期的土地问题为例，武汉政府所辖地区没有马上普遍开展土地革命，共产党的政策规定暂时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这样的问题，能否构成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内容呢？只要认真看一看解放战争时期正确的土地改革的路线和政策，就可以完全明白的。还有，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间，国际上有“远东慕尼黑黑”的酝酿，国内有对日本投降的严重危险。当时共产党的报刊曾指出蒋介石是“暗藏的汪精卫”，蒋介石、汪精卫在降日问题

上“唱双簧”。当时这样宣传是为了唤起全国人民的警惕。但事后看这并没有成为事实。今天有的书籍和文章仍把这样的材料作为历史事实来使用，没有通观一下较长的历史过程，这就不恰当了。

还有一个扩大研究基础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现代史工作者的视野停留在很小的圈子里，限制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例如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现在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但主要还限于毛泽东个人著作的研究上。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只着重一个人的著作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认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更重要的依据应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的报告、宣言和决议，一般说来它们的史料价值远远大于个人著作。研究毛泽东思想还必须研究共产国际的文件，必须研究李大钊、陈独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著作。许多书籍和文章往往不适当地强调毛泽东个人的贡献，除了其它原因之外，没有掌握全面材料、不知道其他人的贡献应是原因之一。

第三，必须进一步贯彻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

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历史研究的一项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史学是要为现实服务的，干预政治、参与政治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这个问题对中国现代史研究来说尤为突出，因为现代史是刚刚过去的历史或仍属现阶段的事实，它和现在的联系特别密切。中国现代史研究在过去离不开人民革命斗争的总任务，在当前离不开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革命性。科学性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说明历史。

过去在革命性和科学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偏向，这就是把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当做最大的革命性，把实事求是说成是资产阶

级客观主义。对反动派只须一律骂倒，无须进行分析研究。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只骂他们是反革命、法西斯、卖国贼，而很少认真分析他们的政治设施，也不去掌握他们的全部活动。对后来犯了错误或走向反动营垒的人，他们以前的所作所为也必须一同否定；如此等等。这既违反科学性的原则，也绝不是真正的革命性。我们应记住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这一至理名言。在学术上违背科学性的革命性是不存在的。现在故意歪曲事实的事很少有了，但由于不注意科学性而得出不准确的论断的事什么时候都会有的。在学术上“左”倾教条主义没有肃清的今天，突出强调科学性是必要的。

第四，必须加强薄弱和空白部分的研究。

不论在广度方面或在深度方面，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都是很不够的。就政治、军事、经济、思想诸方面说，现代经济史的研究更为薄弱。对国民党的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旧中国三十年的经济状况，都不很清楚。过去对旧中国经济的研究，是为了给国民党做政治上的结论，而整个国民经济的具体情况并没有全面和比较精确的论述。对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制度和设施，也没有什么研究。军阀们拥兵割据，连年混战，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特点之一，但我们至今还没有看见一篇关于国民党和整个旧中国军事制度的文章。拿地域来说，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的历史，研究得比较多些，其他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研究得很少。西南军阀、奉系军阀和各少数民族、各个地方的历史的研究，有的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是刚刚开始。文学史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比较好些，特别是文学史，开展比较早。其他方面，例如哲学史则研究得很少，过去的研究只限于政治上的批判。近几年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发表和出版了很多文章和书籍，但对

其他哲学流派则没有什么研究。影响中国哲学的外国哲学有哪些？它们在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都是不清楚的。党史研究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最充分的部分，但由于个人崇拜的影响，由于把毛泽东个人的活动等同于党史的狭隘观点，党史的研究也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薄弱和空白部分，说起来还多得很，但有了上面的例子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综上所述，近几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成绩是空前的，但又是初步的。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但仍然很不够。现在最大的障碍已经除掉，开展研究的良好条件是过去没有过的。因此更大成绩的取得是可以预期的。

这部《百题》中所选的文章，只是有关中国现代史文章中的很少一部分。我们力图使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成果在《百题》中有比较全面的反映，但篇幅所限，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在这个前言中很多地方谈到作为中国现代史一部分的党史研究的成果，因为已有《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版，为避免重复，本书就没有大量选入这方面的文章了。当前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在不断深入，而本书所选的文章有的是60年代、70年代或80年代初期的研究成果，观点上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我们仍然选入了本书，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看法。这部《百题》是中国现代史研究成果的不完全的汇集。已有的成绩是今后前进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前进一步，是我们编选这部文集的真诚愿望。

编 者

一九八五年三月